

新四军在江淮文化建设简论

潘 宏 李 果

提 要：新四军是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由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游击队整合而成。新四军军部于1937年12月组建，虽然地点经常变化，但活动范围集中在江淮地区。在抗战的时代背景下，面对统一战线的复杂局势，深受红军传统和江淮地域文化影响的新四军对文化建设非常重视，其文化充分体现了民族性、大众性、科学性的特点。新四军文化建设成就显著，不仅宣传了抗日，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威望，还为人民军队培养了骨干力量，为新中国培养了建设力量。

关键词：新四军 军部 江淮文化 文化建设

新四军前身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由中央红军1935年长征时留下的部分主力红军及中央苏区的各县武装组成。这支部队当时分散在赣、湘、闽、粤、皖、浙、鄂等地坚持游击战争，成为三年后整编为新四军的主要力量。^①新四军在抗战全面爆发后组建，其主要在江淮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特别重视文化建设，且较有特色。

一 新四军军部在江淮

1937年7月，随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10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将留在南方八省的中共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之后，中共开始新四军及其军部的组建工作。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同时，由中共中央委派的新四军副参谋长周子昆，率3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于1938年1月3日晚赶到武汉，充实到军部机关各部门。为便于就近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工作，4日，新四军军部机关人员由项英率领动身乘船去南昌。新四军军部到南昌后，从1月9日开始办公。^②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期间，主要领导带领军部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到各游击区，传达中央指示、确定部队集中时间、地点和路线。

经新四军军部的统筹安排，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按照国民政府批准的四个支队的建制迅速集结。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各游击队兼程前进，到安徽岩寺集中；江北鄂豫皖游击队分别向合肥、舒城、无为地区集中。除第四支队由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指挥外，其他3个支队则根据军部安排，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破坏日伪的交通及据点。^③

为了方便指挥，在各项事宜准备妥当后，4月4日，新四军军部从南昌出发，于6日到达新军部——安徽岩寺。集中“点验”后的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10个团、1个教导营。据时任军部参谋处长赖传珠的统计材料，游击队“约有8000人左右，3500余支枪，4挺轻机枪及3挺不能连放的重机枪”，加上新招募的战士与配备的梭标、大刀，对外号称全军共1.03万人、6200余支枪。^④1938年5月下旬，新四军军部迁往安徽土塘，经过与国民党当局协商，同年8月2

① 参见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军事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②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③ 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1册，第127页。

④ 参见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79页。

日,新四军军部最终定在皖南泾县云岭。皖南群众基础好,物产丰富,给养方便,适宜设置后方机构。从此,泾县云岭成为新四军在华中抗战的领导和指挥中心。在皖南的两年多时间里,新四军在政治领导、军事指挥、组织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后勤保障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①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1月23日在江苏盐城正式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并将长江南北的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开始独立自主地肩负敌后抗战重任。^②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又迁移到江苏盱眙黄花塘,继续领导新四军在江淮地区坚持抗战,最终迎来抗战胜利。

二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背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四军文化建设成就显著,与其所在的江淮地域密切关联,新四军广大将士多生长在江淮,新四军军部设在江淮。抗日前线与江淮近在咫尺,海外华侨与国内的联络多通过江淮地区,故新四军文化的发展也受这些因素影响。

一是新四军军部高度重视。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就对文化建设十分重视,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千方百计搜罗人才。叶挺以自己的特殊身份,在老同学、老战友间积极活动,在亲朋好友中广泛招募人才。他热情动员从日本留学回国的青年医学专家沈其震担任新四军军医处处长,委托他组织筹建战地医院,并动员一批医生和护士参加新四军工作;知名教授林植夫听说叶挺当新四军军长,主动要求参加抗日,被委任为敌工部部长;北伐时期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三军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朱克靖、进步青年王聿先、叶挺的胞弟叶辅平、侄子叶钦和等20多人,也先后来到新四军。^③1940年4月,叶挺到重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询问叶挺新四军是否有困难需要中央解决,叶挺希望能调一些文艺骨干到新四军,并点名请求创作《渔光曲》的音乐家任光到新四军工作。^④在叶挺等人的努力下,投奔新四军的菲律宾归国华侨还成立了军乐队。

项英也十分重视文化建设,他对学习抓得很紧,自己还兼任新四军图书馆馆长,经常利用午睡时间看书学习。项英从延安带回速记员开办速记班,并利用速记班记录电台重要新闻,创办小报《广播收音》。项英非常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到新四军工作,并给他们以特殊优待。项英本人的月津贴是5元,而军医处毕业的普通学员的月津贴却高达8元,高级知识分子每月津贴十几元至几十元,少数甚至在100元以上,此外,一些高级知识分子还享受团以上干部的待遇。^⑤针对一些老红军干部不满知识分子享受高待遇的情绪,新四军军部及时召开大会,强调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项英在大会上还提倡要“尊师重教”。

新四军军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不仅体现在生活待遇上,在政治上也予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让他们安心工作。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团长朱克靖曾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军南下突围后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尚未解决党籍问题的情况下,军部大胆任用朱克靖为军政治部顾问,这让他深受鼓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组建战地服务团等各项工作中。后来,在项英的积极努力下,朱克靖重新入党,解决了组织问题。另外,还有一些知识分子不是工农出身,个性特别,但对党非常忠

① 参见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143—144页。

② 参见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新四军·综述》,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第60页。

③ 参见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71页。

④ 参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岁月如歌: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团体》,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2002年,第50页。

⑤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68页。

诚。如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聂绀弩，他生活习惯与常人不同，白天晚起，熬夜写作，和部队严肃正规的生活不大合拍。军部领导对聂绀弩非常宽容，让他安心写作，终成著名作家。^① 在新四军军部的重视下，知识分子在新四军文化建设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在创建之初还建立战地服务团，团长朱克靖曾留学苏联。战地服务团分戏剧、歌咏、绘画、舞蹈、民运等多个小组，服务团中有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有延安陕北公学的学员，还有海外华侨和知名学者，他们政治素质高，文化修养好，成为一支过硬的文艺战斗队，大体规模保持在100人左右。^② 1940年7月，服务团渡江北上，隶属苏北指挥部，因此在皖南事变中没有受到损失，后改为新四军第一师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以音乐、戏剧、美术等文艺活动为武器，也为新四军文化的繁荣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二是国统区抗日救亡的形势紧迫。国难当头，宁、沪、杭等文化发达地区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积极向我党靠拢，要求抗日报国。据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回忆：“抗战一开始，由于国内政治生活的要求，新四军从上海、江苏、浙江吸收了上千的男女青年知识分子，这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只能就近涌向新四军。从文化水平的构成来看，八路军就不如新四军了。”^④ 皖南太平县开明士绅刘敬之对我军非常友好，他曾向周恩来提出将其担任小学校长的儿子刘寅带到延安参加抗日。周恩来说要求抗日很好，这里的新四军也是抗日的队伍，跟到延安是一样的。后来刘寅参加了新四军，并在战地服务团任总务处长。和刘寅一样，在八路军驻各地办事处和国统区地下党组织的努力下，不少要求抗日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加入了新四军，这些有文艺专长的知识分子，为提升新四军总体素质，加强新四军文化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40年11月，刘少奇到海安和陈毅、粟裕会合后，就提出要筹办学校，发展苏北民主事业，促进华中地区抗日斗争的问题，后决定要办一所培养文化艺术人才的学校，即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⑤ 1942年2月，华中鲁艺正式在盐城成立，上海、江南江北敌占区和大后方国统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接踵而来参加鲁艺分院。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坚持文化领域斗争的进步人士在香港和上海租界已无法立足，时值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之际，在后方大肆迫害进步知识分子，因此这些文化人士先后投奔新四军军部。在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的关怀和安排下，邹韬奋、贺绿汀等著名知识分子相继来到苏北，陈毅安置他们在离军部很近的村子住下，该村也成为文人集中交流的场所，时称“文化村”。^⑥ 在苏北立足后，文化村的知识分子继续动员群众进行抗战，更助推了新四军文化的发展繁荣。

三是国统区统战工作需要。新四军所在的华中地区经济文化发达，既有国民党友军部队和爱国开明人士，又有众多日伪顽军，政治形势比较复杂，统战工作艰难而重要。

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成立不久，在南昌时就与江西省战时青年服务团、江西省保安处政训队等艺术团体同台演出。蒋经国时任南昌保安处副处长，曾与僚属们到现场观看节目并赞赏抗日精神。南昌群众为战地服务团的演出欢呼鼓掌，为国共两党携手抗日的局面振奋不已。1938年4月，当战地服务团准备随军部北上抗日之时，蒋经国专程为军部和服务团致欢送词：“同志们上前线去，我要赠送你们三件礼物。第一件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件是巩固与扩大

①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64页。

② 参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岁月如歌：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团体》，第48页。

③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75页。

④ 李一氓：《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51页。

⑤ 参见上海市新四军历史丛刊社编：《岁月如歌：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文艺团体》，第56页。

⑥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4册，第107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三件还是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① 新四军还尤其注意运用文化工作在国民党非嫡系部队中开展统战工作，如开展篮球友谊赛，为伤兵演出等。^② 因为这些文化活动的开展，除国民党嫡系个别顽军外，大多数国民党军都对新四军比较友好，甚至在皖南事变前夕还有一些友军向新四军通报消息。

1942年10月，在了解盐阜地区上层开明士绅均爱好诗文后，陈毅便走访盐阜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协商建立诗文社，得到积极回应。11月，陈毅会同李一氓、彭康等文化名人，联合盐阜区庞友兰、杨芷江等开明士绅，成立艺文社。社约里明确规定：“愿以艺文为抗敌服务者方得入社，有破坏抗敌行为经检举证实，国人共弃之。”^③ 在抗战救国的大背景下，以文化为纽带增强统一战线工作的韧度，既丰富了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内涵，也为新四军在国统区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四是红军革命文化传承。新四军脱胎于南方八省红军，红军的革命基因深深地融入新四军广大官兵的血脉，滋养了新四军文化。新四军教导总队主要负责人周子昆，曾任井冈山时期我军第一个教导队——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中央也派出不少抗日军政大学的干部和毕业学员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工作。教导总队直接以延安抗大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队训，教导队的座右铭即毛泽东在抗大毕业证上的题词。教导队在教学上实行军政并举，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延安抗大一样，使众多青年成为了抗日骨干和共产主义战士。在军事教学上，不仅突出发扬我军军事民主，实行官兵互教，勤学苦练，课堂讲授和野外练兵相结合等练兵方法，还教授毛泽东《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抗日游击战争理论。在政治教学上，既有关国内外形势任务的时事教育和锤炼党性的思想教育，还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教育。^④

战争年代，教导队学习条件十分艰苦，学员们夏天挤通铺，冬天无棉衣，上课在露天，但《抗大校歌》始终回荡在皖南山间。皖南事变期间，教导总队的教员学员与装备精良的顽军直接作战，曾打破顽军占领制高点大量杀伤我被围部队的企图，受到了叶挺和兄弟部队的赞扬。^⑤ 总队成员在人员伤亡大、弹药补给少的情况下，忍饥挨饿与敌搏斗，充分体现红军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文化传统在新四军中的传承和发扬。

三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特点

一是民族性。新四军文化建设是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其文化建设不可能超然于战争之外，而只能以抗日救亡为核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陈毅曾讲：“我们的文化运动就要充分提倡与帮助一切抗日的文化工作，组织坚固的文化战线，我们要以伟大文化的歼灭战来歼灭日寇和压倒顽固派的反共文化活动！”^⑥

民族性首先体现在新四军注重用文化直接服务于抗战上。新四军注重抗日报刊出版，各支队相继创办《突击》《前哨》《战士》《拂晓》《挺进》等报刊，进行抗日文化宣传。^⑦ 特别是新四

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49页。

② 参见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编：《铁军轻骑兵：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39页。

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108页。

④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95页。

⑤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308页。

⑥ 陈毅：《陈毅军事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58页。

⑦ 参见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6——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170页。

军军部所办的报纸刊物如《抗敌报》《抗敌》和《抗敌画报》，单从名字上就体现了强烈的抗日救国色彩。其中，《抗敌报》的宗旨就是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投降，报纸形式内容均属上乘，并在全国发行，颇有影响；不定期刊物《抗敌》主要总结交流建军抗战方面的经验教训，为军队干部等提供参考资料，该刊不仅刊载叶挺、项英、陈毅等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言论文章，还经常转载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抗战文章；《抗敌画报》创办于1939年，以绘画形式宣传抗战，内容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深受基层官兵和百姓的喜爱。^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编排的节目也是贴近中国抗战实际。如歌颂战斗胜利的话剧《繁昌之战》；表彰女同志先进事迹的话剧《大时代的女性》；颂扬战士进步的活报剧《张德宝归队》；动员青年参军的歌剧《红鼻子》《送郎上前线》；借鉴闯王进京教训的历史剧《甲申记》等。^②

新四军文化的民族性还表现为注重挖掘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形式。为方便抗日宣传，战地服务团知识分子所创作的作品不断贴近抗日生活，他们采取就地取材，挖掘民间歌谣，结合花鼓、莲湘、湖船和扬州小开口等民间接地气的艺术形式，编填新词，使用当地方言演唱，使抗日宣传通俗易懂。1943年，阜宁文工团创作了反映减租减息斗争的新淮戏《照减不误》，该戏凭着演员标准的淮戏唱腔和演技，广受群众欢迎，不少人还为剧中佃户的不幸遭遇掉眼泪。^③这种让群众一看就懂，一听就会的做法，既宣传了抗日救国，又让民族文化焕发了全新活力，因此广为流传。此外，新四军演唱的歌曲也是方便民众理解，充分发挥歌曲的抗战宣传功能。如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经常演唱的歌曲，混声四部合唱有《国际歌》《抗敌歌》《旗正飘飘》《垦春泥》等；二部合唱有《新四军军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在太行山上》《打回老家去》《军民合作歌》等；齐唱的有《义勇军进行曲》《八路军军歌》《大刀进行曲》等^④，在根据地军民中都广为传唱。

二是大众性。新四军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官兵主体是工农群众，多数人文化程度较低。此外，新四军组建之时的各抗日根据地大多闭塞偏僻，教育一向比较落后。因此，新四军文化建设还具有文化扫盲的大众性特征。识字扫盲被新四军当作部队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组建之初，新四军就开办了教导队，后扩建为教导总队，新四军各团以上机关都设有中小层次的全日制学校。针对广大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状况，新四军开展500字识字运动，其中规定：不识字者要在6个月中至少识500字；算术至少要会四则运算；自然科学要打破鬼神观念，联系军事应用；历史要特别了解帝国主义侵华史和近代革命运动史；地理要认识世界和中国，并联系到抗战形势。识字运动开展后，战士们互相督促加强学习，以多识字为荣。^⑤据邓子恢记载，通过开展识字运动，新四军战士识字50—100字以上者，已达到70%。^⑥新四军文化建设惠及了广大将士，大众性知识水平的提高，也抬升了新四军的整体文化水平。

1941年，刘少奇先召开华中局会议，确定“发展根据地内的文化教育，办理各种学校，训练人民成为新的公民”^⑦的方针，此后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中小学教育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小学以文化学习为主，政治教育寓于文化学习之中，中学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兼顾文化教育，另外还

①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174—177页。

② 参见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6——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第68—69页。

③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147页。

④ 参见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6——新四军文化工作专辑》，第101页。

⑤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30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东南局》编辑组编：《中共中央东南局》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第771页。

⑦ 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第300页。

积极开展冬学识字运动。通过基础的文化扫盲活动,使新四军发展成为一支有文化的部队,也提高了根据地百姓的文化水平。

三是科学性。在抗战实践中科学对战争最显著的关联性意义,在医疗卫生和伤员救治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新四军战地医院的创设为抗战和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医疗工作者艰苦卓绝劳动,使新四军文化建设体现出时代鲜明的科学性。著名医生沈其震担任军医处处长后,动员不少具有真才实学的医务人员到新四军工作。他们中既有南京中央医院、盛京医院、长沙仁术医院等知名医院的医生,也有盛京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南京中央高级护士学校等医学院的毕业生。从新四军军医处成立到1940年,新四军开办了10家医院,20个旅(大队)救护站,200个营(中队)救护队,300个连(小队)急救队。尤其是新四军在皖南建立的两所医院,共有370张床位,能做X光检查和较为复杂的手术。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的3年间,两所医院共收治病人6000余人,手术1443人。^①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在国际性刊物《密勒氏评论报》等报纸上称赞新四军军医院是中国最好的军医院。新四军除了有较高的医疗水平外,还非常重视卫生常识的普及宣传。军医处编印了《卫生季刊》《大众卫生报》等刊物,还多次举办卫生展览,内容有预防天花、疟疾、骨折急救、个人日常卫生等。同时,军医处还制订各项卫生制度,对水源卫生、炊事卫生、环境卫生、厕所卫生方面和个人卫生等方面均有明确细致的规定。1938年,新四军部队疥疮患病率高达90%,经过科学教育和预防治疗,1940年,前方部队疥疮患病率约为8%,后方则只有4%。^②除了在军内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外,新四军还在根据地积极推行公筷运动预防肺结核,动员群众同迷信的、不卫生的封建习惯作斗争,并为群众广泛接种牛痘疫苗,使根据地天花发病率大大降低,这都展示了新四军文化先进的科学性。

四 新四军文化建设的影响

一是提高中共在国统区的威望。新四军文化建设包含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特征,在国统区有力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为提升中共威望作出重大贡献。新四军创办的《抗敌》杂志,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号召全民族进行持久抗战,深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经生活新知书店在重庆、昆明、贵阳等地发行后,扩大中共政治影响力,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茂林是皖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新四军民运工作队进驻茂林后,积极运用抗战歌曲、绘画、纪念会等方式宣传抗战,使国民党特务分子又恨又怕。皖南事变前夕,觉醒了的茂林人民还召开了有3000人参加的大会,呼吁团结,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③1940年,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开办《江淮日报》《江淮文化》等报刊,并建立苏北抗大和鲁艺华中分院,一时苏北盐城俨然成为文化重镇。各界人士纷纷到盐城商讨国事,我党的威望大大提升,引起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极大恐慌。陈毅在盐阜区创办诗文社后,和陈毅有诗文往来的许多开明乡绅都积极向我党和新四军靠拢。在日军进攻盐阜区的情况下,盐阜区副参议长计雨亭,还动员其在国民党军中任职的儿子带领190多个青年参加了新四军。^④

二是培育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新四军通过开展文化教育、扩大文化宣传,启发人民群众的抗日觉悟,激发人民群众的必胜决心。毛泽东认为启发民众的抗日自觉非常重要,“如此伟大的

① 参见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卫生分会编印:《新四军卫生工作史话》,2005年,第3页。

② 参见江苏省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卫生分会编印:《新四军卫生工作史话》,第5页。

③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323页。

④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编辑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史料选编·抗日战争时期》第4册,第129页。

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歌剧《送郎上前线》，久演不衰，歌剧里“民族解放再团圆”的唱词感动许多根据地群众。演出完毕后，就有群众要求加入新四军，还有群众积极加入到农抗会、妇抗会等抗日团体中来。^②在国民党军正面战场连续溃退的情况下，文化宣传对激励群众坚持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地服务团首次在敌后亮相，就出演了击毙日寇、挥舞军旗的场面。饱受日军欺凌掠夺和国民党兵痞敲诈勒索的敌后人民，首次看到人民军队坚决抗敌的场面，振奋不已，坚定了抗日必胜的信心。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创作出皖南事变的连续宣传画，配合戏剧音乐到群众中宣传，服务团成员流着泪讲，军民流着泪听，激发了群众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斗志。

三是培养大批领导干部。新四军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许多新四军培养的干部成为我党我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骨干力量，日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领导力量。新四军教导总队对广大干部军政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自1938年创办起到皖南事变止，约有4000至5000人^③在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或工作过。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原属新四军师以上干部，基本上都在教导总队学习过。教导总队第一期学员朱云谦和张日清，后来分别担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编成中，新四军培养的干部，以文化水准高，科学决策能力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被委以重任，在各自岗位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是贮备新中国的建设力量。新四军军部的财经工作者，不仅创造性的完成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保障供给任务，而且还给陕北党中央以财力支援。他们创建的预决算、会计、审计、金库、税收等制度，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工作作参考。^④经济学家、新四军教导总队训练处处长薛暮桥，后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泰斗，被誉为“市场经济拓荒者”。新四军在文艺战线的知识分子，历经革命战争年代的洗礼，成为了政治坚定，业务精湛的专门人才。原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许多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了文化部门的领导骨干或者美术家、作曲家和知名导演，如文化部原副部长徐平羽，首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霓虹灯下的哨兵》作者沈西蒙，著名作曲家何士德、章枚、沈亚威，美术家沈柔坚、涂克、赖少其，舞蹈家吴晓邦等。新四军卫生战线的人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成为我党我军卫生部门的骨干，如中科院院士沈其震，卫生部监察局原局长戴济民等，他们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在江淮地区这片厚重的文化土壤上，新四军的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硕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⑤新四军之所以能坚持抗战取得胜利，其文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要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也需要先进的强军文化作支撑。同时，善待知识分子、尊重人才，继承革命传统、聚焦时代主题，走群众路线、发掘民族特色文化，这些新四军进行文化建设的经验，也能为当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所借鉴。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

本文责编：周 全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②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39页。

③ 王辅一：《新四军事件人物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页。

④ 参见徐则浩、宋霖主编：《新四军军部在皖南》，第280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11页。